

## 趙起《种太尉傳》所見的 六逋宗之役(公元1077年)\*

曾瑞龍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對研究戰爭史的學者來說，一次軍事行動的成敗可以從象徵和理念的層次去了解，也可以從戰役運作的層次去了解。弄清楚這兩個層次的分野是非常必要的。這樣說並非由於我們力持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的成見，排斥一切與軍事行動有關的象徵和理念因子，而只追求軍事業務本身的目標。相反，作為歷史學者，有需要承認軍事行動的直接後果，和人們對這種後果如何詮釋，同樣屬於歷史範圍內的事情。只看到戰爭如何滿足文化的象徵主義和身分認同，而不能從實際運作的層面去詮釋；又或太強調戰役取向(operational preference)的重要性，而未能恰當評估規範(norm)和意識形態對武力的維制(restraint)，都有以偏概全之弊。<sup>1</sup>弄清楚這兩個層次的分野，能令人看到歷史上有不知多少次，在勝利女神的象徵標誌下是如何不徹底的軍事征服；同時也令人看到，一次軍事勝利在人的觀念中是怎樣地被消化吸收，亦決非一成不變的事情。如果戰勝攻取與國家和軍隊的組織文化存在難以調和的衝突，這種勝利便帶來較大的爭議性。<sup>2</sup>總之，軍事行動的成果，在象徵/理念的層次和戰役運作的層次往往有一段距離，而這段距離，是歷史學者在研究與戰

---

\* 本論文初稿曾於臺灣大學歷史系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在會議上得到評論員李天鳴的精要評述，又得聆梁庚堯、王瑞來、湯開建、江天健、方震華、龍沛(Peter Lorge)等學者的寶貴意見，令這篇文章增色不少，謹此致謝。

<sup>1</sup> 前者的代表可舉 Jonathan R. Adelman and Shih Chih-yu,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ROC, 1993)；後者近年有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一書較能從理論層次去剖析。

<sup>2</sup> Jeffrey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作了理論回顧和討論，並提供了某些二次大戰的實例。

爭相關的課題時所需要預計到的。本文將要論及的熙河拓邊後段所發生的六逋宗之役(1077)，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按宋代官方的說法，熙河之役以熙寧六年(1073)十月王韶(1030-1081)取洮、岷一戰結束，共得地二千餘里，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解所佩金帶賜王安石(1021-1086)，作為勝利的標誌。<sup>3</sup>無疑，這是王韶個人事業的頂峰，甚至也可以說是王安石一生最光輝的時刻之一。的確，王韶的邊功是劃時代的，但從熙河拓邊的全部過程來看，他只是開拓者，還遠遠不是一個收成者。事實上熙河之役的軍事行動並未結束，熙寧六年也不是這個地區走向穩定的標記。在六逋宗之役以前，宋人還未能有效地控制熙河路的南部，岷州一再呈現不穩，而洮州一帶大概還未建立有力統治。王韶初期的主要成就，是鞏固了秦州古渭寨向西的突出部，並隨著俞龍珂(1071年後改漢名包順)的降附，擴大到岷州；然後北上築渭源堡、乞神平，進據洮河上的武勝，建為熙州。可是王韶向河州方向的攻略，就遇到很大反覆，河州得而復失，幾經爭奪才勉強立住腳跟。王韶為了穩定河州的局面，三度向洮河上游進行釜底抽薪的掃蕩作戰，但從未真正控制該地區，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1017前-1091)和冷雞朴(?-1077)仍在頻密活動。潛在的危險更來自北邊，西夏在蘭州外圍的西市城、汝遮谷都駐有重兵，威脅著王韶的補給線。換言之，南北兩翼都不安全。這個問題的開始解決要到李憲(死於1092)的任內。熙寧九年(1076)，宋廷起用种諤(1026-1083)知岷州，在鐵城之戰擊敗了青宜結鬼章。熙寧十年(1077)，李憲轉守為攻，發動六逋宗之役，才真正殲滅了冷雞朴的勢力。從此一直到元祐二年(1087)，洮南一帶不再有劇烈的軍事對抗。1087年鬼章就擒以後，宋人便真正控制了洮、岷地區。至於北翼安全問題的舒緩，要到元豐靈夏之役(1081)，李憲取汝遮谷、西市城和蘭、會二州，西夏對熙河的軍事威脅才為之稍減。紹聖(1095-1098)以後，宋軍進築葫蘆河川和天都山，西夏的中央戰線受到威脅，在側翼戰場的影響力便大為消退，宋人在熙河的統治才達成真正的穩固。總之，王韶時代的熙河路仍然好像從秦州—古渭—熙州—河州的一條線，到李憲的手上才真正成為一個面，而六逋宗之役是這項轉變的其中一個關鍵。可是傳統以來，李憲的戰功不像王韶那般受到重視，這和李憲身為宦官的屬性有關，但也不可忽略其手下戰功特高的种諤，也是一個極富爭論性的人物，及六逋宗這個會戰地點並非一個政治中心，未能有效地提供一種象徵意義上的勝利標誌等要素。

關於六逋宗之役，傳統史料是有記載的，但非常零碎和模糊。《宋史》和《東都事略》的〈种世衡傳附种諤傳〉，以及《宋史·李憲傳》都有相當簡略的記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對作戰經過的描述也是非常簡略，大致上和《宋史·李

<sup>3</sup>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簡稱《長編》)，卷二四七，頁6022-23。

憲傳》來自同一個來源。不過《長編》的好處是附有這一役後諸將遷官的詳盡紀錄，對弄清楚戰情發展有不少作用。此外，《東都事略·姚麟傳》和《宋史·李浩傳》對戰情有片段描述，可是卻沒有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近人對唃廝囉王朝及北宋熙河開邊的考證，以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一書論述最為豐贍，然而也沒有論及這一役的重要性。以青唐唃氏為專研範圍，特別是曾撰專文討論鬼章軍事活動的鈴木隆一氏，在該文也只討論了种諤的鐵城之役(1076年)，而沒有注意到規模更大的六逋宗之役。<sup>4</sup>筆者並非吐蕃史專家，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在於從种氏將門的研究旁涉而生。<sup>5</sup>寫這篇稿子本來只是基於一個單純動機，想弄清楚鐵城之役後的种諤為甚麼忽然從引進副使一下子擢昇為東上閣門使？當時認為這一定有相當可觀的戰功才行。慢慢地搜集了一些零碎史料，最後令我獲得較大進展的，是看到了宋人趙起《种太尉傳》一書，裏面有大段關於六逋宗戰役的描述。根據這本較少被引用的著作，輔以其他史料，以下嘗試勾劃出六逋宗之役的大致輪廓。當然，由於筆者並非研究唃廝囉王朝的專家，內文一定有很多錯漏，需要專家的意見來糾正。

### 關於趙起《种太尉傳》

北宋後期的名將种諤，一生銳於拓邊，四次策動向西夏的戰爭，兩次贏得對吐蕃的主要戰役，是宋神宗一朝拓邊活動的主角。不論對他的評價是好是壞，當時「种諤不死，邊事未已」的蓋棺定論，反映出他在對外戰爭中的重要角色。像王安石及其主要助手一樣，种諤在熙豐新政期間表現活躍，勇於立事，因而受到舊黨大事抨擊，正史也記載了他一生行事的不少污點，其中可能包含惡意中傷，使我們對這位歷史人物進行客觀評價時遇到一定困難。

筆者開始留意种諤的生平事蹟，是在1982–1984年撰寫以种氏將門為題的碩士論文的時候。當時所根據的主要史料是《宋史》和《東都事略》的〈种世衡傳附种諤傳〉，

<sup>4</sup> 參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有關章節，頁92–116。鈴木隆一：〈青唐大酋青宜結鬼章と熙河〉，原刊於《安田學園研究紀要》卷二七，頁36–42；收入《中國關係論說資料》卷29(1987年)，第三分冊上，頁182–85。此外陳守忠：〈王安石變法與熙河之役〉，原刊於《甘肅師大學報》1980年第3期，頁3–14；收入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述》(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13–27，亦未提及此役。廖隆盛：〈北宋對吐蕃的政策〉，原刊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四期(1976年)；收入國立編譯館(編)：《宋史研究集》第十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年)，頁93–144，提及斬斃雞朴一事，但敘事上與熙寧九年底的鐵城之戰未加分別。

<sup>5</sup> 構成本文寫作的背景是筆者1984年所撰的碩士論文：〈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未發表，1984年)。當時由於《种太尉傳》一書尚無緣寓目，對六逋宗之役並未加以留意。

加上《長編》、《宋會要》和《涑水記聞》等書中的有關記載。筆者在一年前在劉琳、沈治宏所編《現存宋人著述總錄》中得悉北京圖書館藏有趙起《种太尉傳》明鈔本，後來更發現此書已收入《四庫全書目叢書》面世。<sup>6</sup>北京圖書館藏本全一卷，共七頁，每頁左右十四行，每行上下二十一字，首頁上方殘缺，內文部分單字略有斷爛，可能是宋版摹抄本。臺北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藏《穴硯齋史鈔》所輯《宋武臣傳》有另一抄本，共八頁，每頁左右十二行，每行上下亦二十一字，全卷完整。

《种太尉傳》最耐人尋味的是其作者。种諤死後，已有范育(?-1085後)替他撰寫墓誌。范育之父范祥(亦名范翔，十一世紀中葉人)是北宋開邊政策的老祖，曾在秦州進築古渭寨，後來王韶在此基礎上擴大邊面，建為熙河路。范育是种諤的得力助手，後來擔任熙河路帥之後，又讓死去的老上司的弟弟种誼(?-1087後)、兒子种朴(?-1099)來當將佐，與种諤的關係非比尋常。然而趙起是何許人？和种諤的關係如何？撰寫《种太尉傳》目的何在？目前找到的記載非常有限。作者署名「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撰」，《宋史》無趙起傳，四庫館臣的案語說「河汾地廣，不知其里貫何所也」，<sup>7</sup>顯然表現出他們對作者的生平難以根究。

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宋代有兩位趙起。第一位是《宋元學案補遺》引《劉後村集》所記趙綱的父親，是尤溪人氏，號石門居士。<sup>8</sup>從籍貫與字號來看，與《种太尉傳》的作者有較大距離，不大像同一個人。另一個趙起見於《宋會要》，是兩宋之際牛皋的部下。紹興三年(1133)牛皋和彭玘率部自偽齊歸宋，襄陽鎮撫使李橫奏請將二將麾下將佐授予原來官職，其中趙起在諸將中居首，是武經大夫、達州刺史、知信陽軍。<sup>9</sup>這個趙起的籍貫和字號不詳，也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种太尉傳》的作者。不過如果從兩個可能人選中比較，牛皋的部下趙起來自京西，與《种太尉傳》的作者自稱「河汾散人」這條線索略為接近一些。同時，他本身是軍官，與書中具體地描述戰鬥序列和戰術動作的視角也比較配合一點。當然，上述推測並不排除尤溪學者趙起從某種途徑得悉种諤生平，又或兩個都不是《种太尉傳》作者的可能性。

趙起其人身分曖昧不明，書是宋人所作則不成問題。這本書《宋史·藝文志》有著錄，說「《种諤傳》一卷，趙起撰」。<sup>10</sup>李燾注中兩度引用這本書，也是寫作趙起《种

<sup>6</sup> 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曾影印寄來《种太尉傳》北圖本一份，謹此致謝。

<sup>7</sup> 清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卷十三〈史部傳記類存目〉，頁13。

<sup>8</sup> 清王梓材(輯)：《宋元學案補遺》，收入王德毅(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249冊，卷四九，頁710。

<sup>9</sup> 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以下簡稱《宋會要》)，兵十五之二，頁7017下。

<sup>10</sup> 脫脫(1313-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三〈藝文二〉，頁5122。

諤傳》，說明這本書成書年代在《長編》之前。書中對宋神宗的稱呼，多處稱「上」，一處稱神宗廟號，<sup>11</sup>說明書成於神宗去世之後。由於這本書並沒有收進《四庫》，只有存目，內文中宋代對邊疆民族某些帶貶義的稱呼仍舊未遭篡改，如稱西夏為虜、酋、賊、偽、敵、羌、夏羌、夏兵，夏人；吐蕃為戎、酋、敵等，不一而足。<sup>12</sup>書中對兩位宋將王君萬、楊萬的姓名均寫作王君曼、楊曼，但在「官軍二萬人」、「斬首一萬級」、「白金一萬兩」和「賊十數萬」的場合都仍作「萬」字，未知何故。<sup>13</sup>

至於書名，卷末作者已自稱「故慨然次其行事，作《种諤傳》云」，《長編》、《宋史》也都作《种諤傳》，因此《种諤傳》才是這本書的原來標題。四庫館臣對書名有如下的說明：

其書專記龍驤四衛指揮使知延州种諤事蹟。……末云次其行事，作《种諤傳》，而此本前題《种太尉傳》。考：史不言諤官太尉，此傳亦無此文。蓋自唐以後，武臣顯貴者往往加至太尉，遂習為尊稱，不必實居是職。如李煜歸宋後，祇為特進隴西郡公，而徐鉉奉詔往謁，乃語闡者，稱願見太尉。蓋當時流俗，有此等稱謂。意其猶宋人舊題也。

四庫館臣從太尉是宋代對武臣的尊稱，而判斷這書名是宋人舊題，基本上是可以同意的。可是館臣沒有注意到它在《宋史·藝文志》已有著錄，而書名是《种諤傳》。目前這個叫《种太尉傳》的，似是當時流傳的某一個鈔本的名稱，而不是它比較正式的書名。

那麼《种諤傳》是否就是《种太尉傳》呢？從我們僅有的史料看來，初步可以看成同一本著作。現存《种太尉傳》鈔本的末尾就已提到書名其實叫《种諤傳》，不但作者、卷數和《長編》、《宋史》所載的《种諤傳》完全相同，就是《長編》注中所引用的兩處來看內容也一致。<sup>14</sup>

由以上討論可以初步指出，《种太尉傳》是宋人趙起所作，原名《种諤傳》，曾為《長編》所引用，《宋史·藝文志》也作了著錄。從書中提及神宗的廟號來看，估計著作的上限是哲宗一朝(1086-1110)，而下限是《長編》神、哲二朝部分的成書年代，大

<sup>11</sup> 趙起：《种太尉傳》，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全一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第81冊，頁6b。

<sup>12</sup> 同上注，頁1b，4b，5b(兩次)，6a；2a(兩處)，2b；2b，4b，5a；5a(兩次)；1b，2a；2a，2b，4a，4b，5a(兩次)，5b，6b(四次)；2b；1b；3b，6a；3a；3b；3b。

<sup>13</sup> 同上注，頁2b，3b，4a。

<sup>14</sup> 《長編》卷三二〇，頁7730注：「趙起作《种太尉傳》云：『諤以十一月十三日至白池，準詔班師。』當考。」又卷三二九，頁7923關於种諤受徐勳連累降官一事，分別見《种太尉傳》頁5b及6b。

概是淳熙元年(1174)左右。<sup>15</sup>作者生平及與种諤的關係均不詳。如上文指出，在南宋紹興三年牛皋、彭玘手下的部將趙起，和尤溪學者趙起兩個人選其中，前者的機會略高一線，但也有可能兩個都不是。從書中對种諤的幾次戰役經過都有詳盡披露看來，作者可能是接近种諤的指揮核心的人物。

《宋史·种諤傳》對种諤的邊功是持比較負面態度的，其中對他種種不利的評論，諸如「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sup>16</sup>四庫館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承襲了這類見解，因此說：「史稱諤雖名將，而喜事貪功，實開永樂之釁。今傳中無貶詞，殆亦不無溢美矣。」很可能這就是《种太尉傳》沒能被收進《四庫全書》的原因。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四庫館臣似乎只是偏信正史，對种諤的生平沒有作過細緻的研究，連种諤的官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也誤作「龍驤四衛指揮使」，顯示了館臣對北宋禁軍四廂都指揮使的官名欠缺認識。

四庫館臣覺得傳中沒有貶詞是一種闕失，因此沒有將它收入《四庫全書》。從嚴謹的史學立場而言這是很正確的，但從保存史料的角度而言，卻是可惜的事情。從內容看，它不是《宋史》和《東都事略》中《种諤傳》的同源史料。據筆者目前的認識，《宋史》和《東都事略》的《种諤傳》是按照范育所撰的《种諤墓誌》為主要藍本，而加以近乎舊黨立場的一些評論而成。范育所撰的种諤墓誌今已不存，但從《長編》所引用的段落中，仍可窺見其大概；而趙起《种太尉傳》在文字和記載方面，都沒有沿襲這些作品的明顯痕跡。其次，它描述補充了种諤生平近乎空白的一些環節，如六逋宗之役(1077年)，《宋史》的記載就極其零碎；《种太尉傳》也有一些片段與《宋史》和《東都事略》中《种諤傳》可以互相補充，如取綏州(1067年)、拔米脂(1081年)兩次作戰，都涉及一些《長編》、《宋會要》和《宋史》所沒有記載的細節，有一定史料價值。以下章節以《种太尉傳》為核心，佐以各家史料，論述六逋宗戰役的經過和重要性。

## 六逋宗戰役的醞釀

王韶收熙、河，「逐處蕃部，各懷震怖」。<sup>17</sup>唃廝囉的繼承者董氈(1032-1083)感受到威脅，便以大首領青宜結鬼章和冷雞朴經略洮西，以復故疆。自熙寧七年(1074)至十年，青宜結鬼章和冷雞朴是宋軍在洮西的大敵。熙寧七年踏白城之戰，宋將景思立(1074卒)、王寧(1074卒)戰死，鬼章函二將首級自隨，經常出示西域諸國的使

<sup>15</sup> 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4-26。

<sup>16</sup>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10748。

<sup>17</sup> 《長編》卷二四七，頁6032。某些記載顯示宋朝官員受到吐蕃人民的歡迎，可能反映不同地區的狀況，見《長編》卷二四一，頁5886。

節。熙寧八年八月，朝廷一度以邊事平息，下令熙河路及洮西安撫司由每十天報平安改為每月一次。<sup>18</sup>十二月，河州木宗城首領投宗哥，被定羌城熟戶斬首來獻。<sup>19</sup>熙寧九年一月，鬼章令首領結氈攻河州，不料結氈與其甥斯巴溫同謀殺鬼章，鬼章走塔南城。<sup>20</sup>二月開始，軍事行動重新逐漸昇級，鬼章取道棟棟谷，入五牟谷，蕃官蘭氈納支加以邀擊，斬四百七十級。同時，董氈以旗號、蕃字至洮、疊二州誘「順漢蕃部」，引發與洮東安撫司的小規模武裝衝突。<sup>21</sup>三月，鬼章再進至五牟谷，被熙河鈐轄韓存寶(1081卒)所敗。宋廷隨即起用种諤知岷州。<sup>22</sup>五月，冷雞朴圍河州郭莽寺，被寺僧和蕃部拒退。<sup>23</sup>隨著熙河路南部形勢愈趨緊張，王安石與王韶之間發生歧見。王韶主「省靜」，不想過分追究諸將違法的事件，王安石則不以為然。<sup>24</sup>六月，宋人探報西夏起兵十二萬來取熙河，王安石當即表示懷疑，說夏國每次進攻「罕能及二十日」，即使探報屬實，也無須過慮。<sup>25</sup>結果西夏並沒有發動這種規模的進攻，但這份情報也代表熙河路局勢不穩，指揮層杯弓蛇影的心態。十一月，鬼章逼近岷州。蕃官包順先打了一場前哨戰，斬首二百六十餘級。<sup>26</sup>稍後，洮東安撫司報稱「鬼章領兵入斯納家地，未知營寨所在」。宋神宗大為緊張，立即詔「昭宣使、入內押班李憲乘驛計議秦鳳、熙河路經略司措置邊事」。次日，下詔補充說明李憲的權力：「憲至，軍前一應將官等，並聽憲指揮。」<sup>27</sup>李憲一掌握完全的指揮權，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張洸便實際上被架空了。一如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和彭汝礪之言，「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為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sup>28</sup>

可是李憲還沒有到任，宋洮東安撫司在知岷州种諤的指揮下，迅速而果斷地平定了內部蕃情的不穩，繼而又取得鐵城之戰的勝利。《長編》寫出种諤先揭發了一起吐蕃人的襲擊事件：「先是，鬼章聚兵令丁谷脅屬羌瓜家族以叛，諸部皆動搖。……戮瓜家族叛黨二百餘人，諸部乃定。」關於這件事的始末，《种太尉傳》有較詳盡的說明：「冬十月，董氈將鬼章聚兵冷丁谷，脅誘瓜家族。公計之，曰：『彼必有外來為

<sup>18</sup> 《長編》卷二六七，頁6552。

<sup>19</sup> 同上注，卷二七一，頁6653；《宋史》卷十五〈神宗紀二〉，頁289。

<sup>20</sup> 《長編》卷二七二，頁6658；《宋會要》蕃夷六，頁7824上。

<sup>21</sup> 《長編》卷二七三，頁6676，6687。

<sup>22</sup> 同上注，頁6695；《宋史》卷十五〈神宗紀二〉，頁290。

<sup>23</sup> 《長編》卷二七五，頁6726。

<sup>24</sup> 同上注，頁6730。

<sup>25</sup> 同上注，卷二七六，頁6740。

<sup>26</sup>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27。

<sup>27</sup> 同上注，頁6835。

<sup>28</sup> 同上注，頁6839。

亂者。』因授糧，曰：『索於鞠場中。』果有裹甲懷兵而入者，得二百人，悉斬以徇。奪其馬械，賞戰士，諸部畏若神明，不敢復貳。」<sup>29</sup>

緊接而來的是鐵城之戰，《宋史·神宗紀》載：「十一月，……壬午，鬼章寇岷州，知州种諤等敗之鐵城。……二月，……戊子，以鬼章敗，种諤等賞官有差。」《宋史·种諤傳》也記載：「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敘事都比較簡略。《長編》記載「洮東安撫司言，鬼章結連南北諸羌人寇岷州城寨，占據鐵城，誘脅青唐等族，日夕搖動，已有附賊」。<sup>30</sup> 岷州形勢之危急可見一斑。《長編》又載：

熙河路經略司奏：「……崇儀副使、知岷州种諤與東頭供奉官、走馬承受康識計議，十一月辛巳帥兵赴和爾川寨，翌日至鐵城，遇賊，斬首八百八十二級，及殺宗哥首領等。本司勘會鬼章引宗哥之兵，驅脅熟羌，深入寇邊，賴包順、馬忠密請出兵，諤、識能用其言，將佐協力，迎擊取勝。」詔諤遷引進副使，識改一官，與閤門祗候；皇城使包順、馬忠並遷遙郡刺史，順康州，忠達州，各與兩子恩；崇儀副使趙紹忠為內藏庫副使，趙醇忠為六宅副使，文思副使魏慶為左藏庫副使，西京左藏副使包誠為供備庫使。餘遷官、減年有差。識，河南人也。<sup>31</sup>

據此，种諤採納了蕃官包順和馬忠的情報，與走馬承受康識計議，然後發動進攻，但所謂計議的內容沒有說明。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記載來自熙河路經略司的奏報，而非來自李憲，很可能當時李憲尚未抵達，或其指揮部未正式運作。當時局勢嚴峻，种諤勢不容緩地出兵，《長編》又載：

壬午，知岷州种諤破鬼章於鐵城，斬首八百餘級（此據明年二月七日奏，今年十一月二十日事。……），諤出輕兵掩賊不備擊敗之。……鬼章又以兵三萬據鐵城，收貝斯結、羅斯結族以臨青唐。諤知羌素持貳，觀勝負以為去就，乃盡出兵二千，未明抵鐵城。賊不意漢兵至，驚擾莫知所為。縱兵擊之，鼓譟乘城，賊眾大潰，斬首八百餘級，鬼章乃遠去。岷境屬羌，不敢復貳（此據范育墓銘）。<sup>32</sup>

<sup>29</sup>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27；《种太尉傳》，頁3a。

<sup>30</sup> 《宋史》卷十五〈神宗紀〉，頁290-92；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10746；《長編》卷二八〇，頁6861。

<sup>31</sup> 同上注。

<sup>32</sup> 同上注，卷二七九，頁6827。



這裏看出，种諤的計謀是攻其無備，成功的一個因素是夜襲，「未明抵鐵城」一句說明了這種情況。可是鬼章既已逼近岷州外圍，何以容許部下這般不明斥堠，仍然有一點不甚明朗。看了《种太尉傳》，這個疑團就可以得到解釋。關於鐵城之戰，趙起作了如下記載：

十二月，鬼章盜寇鐵城，降戎弊廝〔逋〕、祿廝結族皆應之，欲東南搖青唐。公陰將掩之。會走馬〔承〕受康識撫問迴，乃行送十數里，至精精堂，猶發餘兵還岷，示無出掠意。乘夜，以銳卒二千趣鐵城，鬼章重兵在西谷中，公先命驍騎斷其後。始明，薄城會戰，公躡從者肩，登其東南隅，揮劍大呼，僚吏蟻附，遂破之。斬首八百級，取大首領廝鐸彎，鬼章遁去。以功遷引進副使。<sup>33</sup>

至於作戰的時間，《宋史》本紀作十一月，《种太尉傳》作十二月，似乎《宋史》較為正確。鬼章由冷丁谷挺進至鐵城，是這條史料最關鍵之處。冷丁谷又名冷地峪，清《洮州廳志》云在洮州以「東五十里與岷州分界處」。<sup>34</sup>至於鐵城堡，宋人記載在岷州以東八十里，<sup>35</sup>鬼章據鐵城，已構成互相楔入的狀況，切斷對方退路是必要措施，故這一役的關鍵不在於「驍騎斷其後」，而制勝關鍵在於發起攻擊的時機。據以上史料，种諤贏得這一役，是運用了兵法上「用而示之不用」的謀略。如上所述，鐵城在岷州以東，种諤送走馬承受康識回朝，東向行十數里，本有順手牽羊，乘便掩擊的機會，卻故意折回岷州，讓對方喪失警惕，到半夜才出其不意突襲，確是名將本色。《种太尉傳》記載這一戰斬獲吐蕃首領廝鐸彎，很可能就是前引《長編》所謂的宗哥首領。由於鬼章逃去，宋廷高價懸紅緝拿鬼章和冷雞朴：

庚戌詔：「鬼章、冷雞朴驅率蕃部為寇，使諸族帳不得安居。諸人及生熟蕃部得鬼章首來獻，授左藏庫使，賞錢五千緡，與本族巡檢使。得冷雞朴，授東頭供奉官，賞錢三千緡，與本族巡檢。並依舊官給俸。如生得鬼章、冷雞朴，賞格外更與優獎。鬼章、冷雞朴如能悔過歸順，官賞亦如之。令熙河路經略司榜諭。」<sup>36</sup>

宋朝的官方史書，有的將此役與六逋宗之役混為一談。如《宋會要》載：

神宗熙寧八年，董氈將青唐結鬼章與冷雞朴大入寇，邊遣內侍省押班李憲捕之。十年，鬼章驅誘熟羌圍岷州城寨，占據鐵城，憲命种諤夜出兵二千，度洮

<sup>33</sup> 《种太尉傳》，頁3a。

<sup>34</sup> 清張彥篤(修)、包永昌(纂)：《洮州廳志》，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四十九卷，卷二，頁十六a-b。

<sup>35</sup> 王存(1023-1101)等：《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三，頁130。

<sup>36</sup> 《長編》卷二七九，頁6846。

水，直抵鐵城。鬼章兵潰，臨斬冷雞朴。於是董氈惱懼，遣首領入朝謝罪。詔以董氈為都首領，結鬼章為廓州刺史。<sup>37</sup>

以上這段文字有幾處錯誤。如前所述神宗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熙河，確屬鬼章與冷雞朴「大入寇」的結果，但不在熙寧八年，而是九年年底。「青唐結鬼章」一名的「唐」字亦誤。更大的錯誤是將鐵城之役與六逋宗之役混為一談。從「度洮水，直抵鐵城」的文理表面上看，鐵城在洮水以西，因此知岷州种諤必須渡洮水，直抵鐵城。可是剛才已經說到，鐵城在岷州以東八十里，而岷州在洮水東岸，可見种諤進軍鐵城其實無需渡洮水，如果這樣做的話，反過來只能和鐵城背道而馳！以下史文馬上具載斬冷雞朴，董氈懼而入貢等六逋宗之役的事，可見史臣只是非常表面地從种諤兩次戰役的對手都是鬼章，就誤以為是同一場戰役，而沒有根究鐵城的方位，誤把鐵城當作洮西的地點，這便露出破綻來了。反觀《長編》、《宋史》關於鐵城之戰的記載，都沒有渡洮一事，更說明修撰《宋會要》的史臣不究本末，將兩件事混為一談。這可能是單純地出於節省文字的需要，但結果卻令事實糾纏不清。

其實鐵城之戰的規模不大。鬼章的兵力，《長編》據范育〈种諤墓志〉作三萬，<sup>38</sup>《宋史》則失載。至於种諤的兵力，趙起和李燾都作二千人。斬首八百級，全軍平均2.5人斬一級，也算不錯，但和六逋宗之役斬七千級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對宋軍來說，鐵城之戰是一場守勢作戰。种諤運用了彈性防禦的手段，<sup>39</sup>出其不意，先發制人，瓦解了正在部署攻勢的敵軍，自此「岷境屬羌，不敢復貳」，宋軍便轉入攻勢，發動六逋宗之役。

## 作戰過程

《宋史·李憲傳》對六逋宗之役僅作如下記載：

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眾聳視，皆無鬥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sup>40</sup>

<sup>37</sup> 《宋會要》兵九，頁6906上。

<sup>38</sup> 《長編》卷二七九，頁6827。

<sup>39</sup> 有關北宋運用彈性戰略防禦，參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史叢》第三期（1998年），頁143-72。

<sup>40</sup>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李憲傳〉，頁13639。《東都事略·李憲傳》的記載略同。見王稱（?-約1200）：《東都事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卷一二〇〈宦者李憲傳〉，頁1861。

本來殺獲萬計已算了不起的大勝仗，可是主帥的傳中連會戰地點也失載，是後世難以以為這次戰役命名的一個因素。《長編》對作戰經過的描述大致上同《宋史·李憲傳》：

先是，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羌戎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木征盛裝以出，諸戎聳視，皆無鬥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冷雞朴，董氈懼，因作旁行書諭之，遂入貢(此據憲本傳附見)。<sup>41</sup>

這段史料和《宋史·李憲傳》幾乎完全一致，據李燾注中解釋，是參照了國史〈李憲傳〉的結果。很可能，《宋史·李憲傳》、《東都事略·李憲傳》和《長編》對作戰經過的描述都是來自同一藍本《國史·李憲傳》。根據這些史料顯示，這次勝利得來相當容易，因為唃廝囉的孫兒木征(?-1077)三年前已降宋，而「羌人天性畏服貴種」，一見木征盛裝出陣，馬上就士無鬥志，很輕易地被宋軍所擊潰了。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在章節中沒有提及此役，唯在〈木征〉及〈大事年表〉兩處，均以一句述及木征助宋擒隆吉卜(即冷雞朴)，注引的也是《宋史·李憲傳》。<sup>42</sup>由於會戰地點失載，加上這好像是很輕易得來的勝利，筆者初時也一樣沒有察覺這是比較重要的戰役。

至於《宋史·种諤傳》，對此也輕輕帶過，說：「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下』字疑為『六』字之誤〕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至大河，斬首七千級。」《東都事略·种諤傳》則謂：「李憲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為七軍，諤將左軍自岷州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sup>43</sup>

這兩個〈种諤傳〉都以很簡略的筆墨來描述此事，和种諤取綏州、破米脂、議築橫山等重要的軍事活動不可同日而語，可是這裏透露出兩點訊息：首先是對作戰範圍有一個大致眉目。這似乎是很大規模的征戰(campaign)，而不僅僅是一次會戰(battle)——种諤一直從岷州打到洮州，然後取道講珠城直抵黃河，作戰縱深接近200公里。其次，李憲「分兵為七軍」，所指的不知是平時編制還是戰役編制，若然屬於戰役編制，則出動的兵力似乎相當可觀。《宋史·兵志二》載有李憲重新整編熙河駐防部隊為「軍」的事情，說：

六年，熙河路經略制置李憲言：「本路雖有九將之名，其實數目多闕，緩急不給驅使。又蕃漢雜為一軍，嗜好言語不同，部分居止悉皆不便，今未出戰，其

<sup>41</sup> 《長編》卷二八二，頁6904。

<sup>42</sup> 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頁248，268及303。

<sup>43</sup>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10746；《東都事略》卷六一〈种世衡傳附子諤傳〉，頁926。